

# 新时代核威慑的四维审视<sup>\*</sup>

刘利乐<sup>1</sup>, 罗成翼<sup>2,3</sup>

(1.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2. 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3. 湖南城市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益阳 413001)



**摘要:**面对新时代的国际关系和核安全形势,核威慑的复杂性表现为核威慑动机界定、责任划定与善恶判定的复杂性。核威慑本身具有维护和平的低成本与好效果的合理价值,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安全保障。核威慑是对巨大物质力量的意向性,容易对人的自由意志形成压制,造成技术风险、政治风险和道德风险等。核威慑的价值考量应该厘清核威慑的价值来源、价值内容与价值立场。辩证认清核威慑的合理性与风险性,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立场,发挥核威慑的正向价值而避免其负面后果,这是核大国应自觉履行的国际义务。

**关键词:**核威慑;复杂性;合理性;风险性;价值

**在线杂志:** <http://skxb.jsu.edu.cn> **中图分类号:** D035.29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8)04-0099-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ZX104)

**作者简介:** 刘利乐,男,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用本文:** 刘利乐,罗成翼. 新时代核威慑的四维审视[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9(4): 99-106.

前段时间,朝鲜核危机在短暂的缓解之后又起波澜,伊朗核争议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美朝、美伊之间的核博弈难以在短期内达成深度合作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表示,当今世界对核武器的担忧达到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其实,所有核问题归根结底都与核威慑有关,因为核武器决定核威慑能力,核威慑能力决定话语权。核威慑已成为当前不容忽视的问题。面对国际安全形势,习近平要求“把预防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统一起来,把备战与止战、威慑与实战、战争行动与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运筹”<sup>[1]</sup>。进入新时代后,随着我国战略核力量的持续增强和火箭军地位的不断凸显,核威慑的正面价值与负面效应需要新的审视。“讨论核威慑的正义与否的问题,从道德舆论上对核威慑战略进行约

束,是有其现实合理性和必要性的。”<sup>[2]</sup>而核威慑的价值定位正是这一讨论的前提。

## 一、核威慑的复杂性分析

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说:“核威慑尽管是一种拙劣的办法,但是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里,在一个相互猜忌的世界里,很可能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以恶相威胁,目的是为了不作恶。”<sup>[3]304</sup>核威慑在动机、手段、结果上的矛盾性决定核威慑的复杂性。

### (一)核威慑动机界定的复杂性

核威慑是以核武器进攻或者核武器相威胁而实施的威慑<sup>[4]407</sup>。它就是宣称或暗示动用核武器制造恐怖情绪和心理压力,使对方意志屈服而改变

\* 收稿日期:2018-05-02

意图或停止行动。首先,从表现形式看,核威慑包括直接的核威慑和间接的核威慑。直接的核威慑包括核军事行动威慑与言语威慑。间接的核威慑包括常规的核战略巡航、核军事演习与核武力阅兵等展示性活动。其次,从语义类型来看,核威慑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核威慑仅指言语上的威慑,其在冷战时期较为频繁,也是传统核威慑的主要形式。广义的核威慑指言语威慑、行动威慑与展示性威慑。冷战结束后,狭义的言语威慑越来越少,而广义上的核威慑还是广泛存在。因此,我们应该扩大道德视域,进一步研究广义上的核威慑,才能更好地进行核治理。最后,从具体情境来看,核威慑存在核慑止和核驱动两种情况,核慑止是指阻止对手行动,而核驱动是指驱使对手行动。例如,以色列用核武器威慑阿拉伯国家停止攻击其领土的情况就是核慑止。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用核武器威胁前苏联撤走部署在古巴的核导弹的情况就是核驱动。然而,威胁使用核武器还存在一种极端情况——核讹诈。在朝鲜战争和台湾海峡危机期间,美国曾针对中国多次发出核威胁,扬言要实施大规模核打击,这些是毫无正义可言的核讹诈<sup>[5]110-131</sup>。具体而言,核威慑与核讹诈的差别为:在时间上,核威慑只发生在重大威胁将要发生,核讹诈则并没有临近重大威胁。在目的上,核威慑旨在维护和平,核讹诈是为牟取私利;核威慑旨在恢复原状,核讹诈试图改变原状。在手段上,核威慑主体根据对方的侵害程度使用对等的应对措施,而核讹诈则不择手段不区分侵害程度,使用超过实际需要的胁迫来达到非生存性的政治利益。正是因为核威慑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增大了核威慑动机界定的复杂性。

### (二)核威慑责任划定的复杂性

较传统威慑而言,核威慑因其巨大的物质破坏力而发生了质的改变。面对传统威慑,人们似乎觉得不存在道德问题,因为它是为了国家利益而具有合理性。但是,核威慑却大不相同。首先,核威慑涉及利益方较多。核威慑虽是在维护国家的“群体”利益,但也在挑战人类的“类”利益。虽然以国家利益为名发出核威慑,但却不可避免会给其他国家和群体造成威胁。核威慑有可能会引发战争升级,给人类整体生存造成危害。核威慑主体有时以声称攻击对方大城市来威慑对方,这就是使用核武力制造恐怖情绪,较强地附带伤害和道德绑架使对方国民被动产生利益关系。核战争带来的核辐射

能够影响人类的完整性存在,因此核威慑与未来的人也产生利益关系。可见,核威慑涉及的利益主体众多,其中的利益关系也是错综复杂。其次,行为责任分配较难。核威慑包含复杂的心理因素,双方在核对峙升级中的信任、目标、意志等因素相互影响,共同推动核威慑的效果。在核威慑失败后,是否进行核打击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策过程。复杂的情况往往超出了决策者的能力。这些使核威慑责任分配比传统威慑更难。再次,国际社会缺乏判定标准。目前核威慑的话语仍较随意,往往声称“攻击对方大城市”“进行毁灭打击”等,引发了不必要的紧张局势。比如美国和朝鲜间的核威慑就是一口水战。同时,一些国家在核威慑行为上也比较任性,动辄派遣战略轰炸机与核航空母舰等进行所谓的战略巡航。由于目前国际社会尚无针对核威慑的国际法规范与道德准则,也就难以遏止一些任性的核威慑发生。

### (三)核威慑善恶判定的复杂性

核威慑就是使用核武器的意向性。核武器的善恶属性决定了核威慑的善恶属性。核武器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分。从自然属性看,纵使核武器的杀伤力巨大,但它仍是“一种武器”,是人类的“工具”。中世纪的骑士们认为远距离杀人的枪是不道德的,但历史证明,枪既成了保卫自由的武器,也是犯罪的工具。可见,武器的自然属性不存在善恶问题,武器的善恶属性取决于人的价值选择及其意向性。从核武器的社会属性来看,人类最先计划研发核武器的是德国法西斯,其目的是侵略与镇压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民,此时核武器是分有“原初恶念”的。只不过正义的反法西斯联盟能够凝聚更大的心力,抢先制成了原子弹以保卫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自由权利。正义人民的“善良意志”战胜了“原初恶念”,使核武器成为促进和平的工具。然而,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一些政客们就看中了核武器的“便利”。纵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局已定的情况下,美国一些政客仍不顾反对而对日本发出了核攻击。此时的核武器汇集了政治目的、经济目的等复杂动机,已经是“善恶混合体”。此后,冷战对峙时期为巩固核地位而生产的核武器就变成了“权力意志”的载体。直到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霸权主义的横行,一些极端组织开始酝酿谋求获取核武器来发动攻击,这时恐怖主义谋求的核武器就是“至恶”的化身。从核武器的“原初恶念”到“善良意志”,再到“至恶形式”,它经历了武力的辩证发

展,其根本动因在于自由意志与权力意志的对立与统一。现今,自由意志又开始使人类联合起来限制核武器,试图使其复归“良善”状态。可见,核武器的善恶属性根本取决于人的认识与评价,呈现出辩证发展的复杂性。

总之,核威慑的复杂性根源于核威慑动机的隐蔽性、利益主体的多元性以及责任分配的非线性。而核威慑的复杂性并不决定核威慑自身的价值,核威慑所带来的问题根源还在于人类自身。

## 二、核威慑的合理性考察

“在最一般的形式上,威慑是让对手相信,他为采取某种行动而付出的代价或所冒的风险会大于收益。”<sup>[6]371</sup>核威慑因核武器的超杀能力,只需口头警告而不需进行武力反击,就会使对方认为“得不偿失”而放弃行动。核威慑用较低的威慑成本就能获得抑制战争、维护和平的实际收益,这是新时代核威慑所具有的正向价值。

### (一)核威慑与世界和平

核武器诞生以来,虽然给人类带来了潜在威胁,但是客观上能够维护世界和平。一方面,核威慑是一种建构性的防御手段。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认为,“国家是一种权力,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保护 and 促进最高的善”<sup>[4]589</sup>,“威慑权力介于进攻性权力和防守性权力之间”<sup>[4]404</sup>。因此,核威慑也是一种政治手段,是“不流血的战争”<sup>[7]308</sup>,其目的是为了“最高的善”。核威慑的价值并不在于提供了军事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在于它能够打开政治解决的途径<sup>[8]141</sup>。中国兵家也强调“止戈为武”。《孙子兵法·谋攻篇》中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核武器的自然属性使威慑与进攻分离开来,核威慑发挥着“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因此,核威慑本质上是防御性的。另一方面,核威慑具有抑制大规模战争的低成本与好效果。核威慑通常以“你如果……我就……”这种思维方式表现出来,具有互动性的核威慑就自然意涵着“对象性”和“主体性”,那么,核威慑的道德准则也就建立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之上。因此,绝对排斥核威慑的态度和追求绝对安全的核威慑都是不合理性的。核威慑道德只能建立在不断建构的对等关系之中。这种建构的主体间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战争冲动,使“理性从其最高的

道德立法权威的宝座上,又要断然谴责战争之作为一种权利过程,相反地还要使和平状态成为一种直接的义务”<sup>[9]112</sup>。历史表明,核威慑有效抑制了美苏争霸、以色列与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的战争冲突,客观上维护了世界和平。去年7月,联合国推动签署《全面禁止使用核武器条约》,虽然该条约以绝对优势通过,但所有拥核国均不参加会议,使得这一条约难以实际推行。从长远来看,核武器应该被销毁,禁止使用核武器是人类的道德要求。但是从短期来看,即使废除核武器,人类依然会有战争,还可能制造基因武器、纳米武器等杀伤力更大的武器,并且陷入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中。如果没有核武器的威慑作用,不久将来的战争将更加令人担忧。

### (二)核威慑与命运共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要超越国家边界和国家制度差异的制约,从人类整体利益视域来积极构建国家认同基础,用人类的“类我意识”来确立更广泛的“朋友关系”。核威慑虽然可能给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威胁,但也增强了人类“类”意识的发展,刺激国际合作,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一方面,核威慑增强“类”我意识,推进构建命运共同体。核威慑主体必须要顾及手段的相称性以保证人类的整体延续。一些受到威胁的“无辜者”也会诉诸人类的基本权利,如生存权、自由权来控诉。爱因斯坦、罗素等科学家就是以人类代表的身份来反对核武器,掀起了颇具国际影响力的反核运动,强化了“共存共生”的“类”意识,推进构建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核威慑刺激国际核合作,促进打造安全共同体。核威慑战略与核威慑能力建设会引起对国家安全的高度关注,美苏之间的核裁军协议以及国际性的防止核扩散、核恐怖主义系列条约就是为了集体安全。在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期间,中国和美国在《中美核安全合作联合声明》中宣布将致力于减少核恐怖主义威胁,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并使全球核安全体系更为包容、协调、可持续、强有力,以实现共赢和共同安全<sup>[10]</sup>。然而,新时代世界核和平秩序与共同安全仍存在威胁因子。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给中国、俄国的核威慑能力与世界核平衡秩序构成极大挑战。对此,我国应做出对等的应对措施,“建设强大的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sup>[11]53</sup>,确保自身核威慑能力的实效。但我们应坚持核威慑的防御性本质,控制核武力发展的速度与规模,避免陷入不必要的核竞赛之中。



### (三)核威慑与合理价值

“合理(的)”着眼于社会的实质功利目的或价值实现<sup>[12]574</sup>。“合理性”在这里主要是指完成既定目标或生活计划的有效手段。“合理计划是善定义的基础,因为一项合理的生活计划是使和一个具体个人相关的所有价值判断形成并最终变得一致的基本观点。”<sup>[13]410</sup>因此,核威慑的合理性就在于“计划”与“价值”一致。核威慑的合理性可以分为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一方面,从价值合理性来看,由于核威慑缺乏国际法规与伦理的规范,核威慑的价值目标会呈现多元化的特征。价值合理性需要进行价值排序。从目标价值来看,存在保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与非生存性国家利益的排序。保护国家免遭灭亡与保护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等价效益,是核威慑的“至善”。因为“类我”存在于“我者”之中,如果民族国家灭亡,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将不复存在。因此,保护人类命运共同体优于非生存性国家利益。从手段价值来看,存在幸福和效率的排序。作为政治手段,核威慑依赖的是实践理性,追求的价值是幸福。作为技术手段,它依赖的是工具理性,追求的价值是效率。对政治国家而言,幸福比效率更重要。从结果价值来看,存在安全效益与权力、荣誉效益等的排序。安全是“人们追求的首要价值,也是国家发展方略的首要指向”<sup>[14]25</sup>。没有安全,就没有权力、正义、荣誉等。因此,安全效益优于权力、荣誉效益。另一方面,从目的合理性来看,又可分为现实合理性与历史合理性。冷战结束后,世界逐步走向政治多元化和经济全球化,合作的趋势逐渐超过对抗。核威慑“维持恐怖平衡”的历史合理性根基已经逐渐消解。但是,由于人性的复杂性与国际信任机制的匮乏,核武器在新时代短期内不可能消除。新的历史时期赋予了核威慑新的历史合理性内涵。核威慑的现实合理性在于维持现有的和平状态,维护国家的重大安全利益而非一般性国际政治经济利益,为合作提供安全秩序。它的历史合理性在于维护稳定的核安全秩序来推进核裁军和核不扩散,直至彻底消除核武器。因此,我们要“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sup>[11]59</sup>，“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sup>[11]25</sup>。

### 三、核威慑的风险性探究

当前,“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

出”<sup>[11]58</sup>。科学技术不受限制的推进和基于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现代风险社会。正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说,“‘世界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把注意力引向对风险——我们为自己制造的风险——的有限控制的能力上。主要问题是,在人为不确定性的状况下如何作出决定。这种人为的不确定状况不只是知识基础不完全的结果,而是更多更好的知识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不确定性。”<sup>[15]8</sup>核威慑作为科技进步的结果和政治策略的手段,主体在利用核知识和核威慑理论的确定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风险。

#### (一)技术风险

核威慑的技术风险是指核威慑作为一种军事战略手段在实施过程中引发冲突升级的可能性以及它对核技术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心理认知和信息决策上的可能性偏差,存在引发核冲突升级的风险。核威慑作为一种战略技术手段,其依靠威慑理论和心理认知反应,但复杂的心理活动使对象的行为难以测定,可能因对方的心理认知而使威慑失败,以致影响威慑效果。实际上,敌人是一个建构性概念,敌意是建构敌人的心理前提。敌对斗争是由敌对的情感和敌对的意图引起的,而敌对的意图因素比敌对的情感更为普遍<sup>[16]103</sup>。敌意通常是“对立双方都认为对方是非正义的从而相互否定的结果”<sup>[17]114</sup>。由于核威慑传递了一种绝对暴力的观念,这种手段引发的敌意比传统威慑要强烈得多,并带来强烈的恐怖心理而容易形成一种集体的对抗意识和情绪,从深层次造成主体的非理性决策。同时,在紧急情况下核威慑往往由军事首脑临时决策。短时间内的信息不对称局面,很容易造成误判而引发核战争。在不久前的朝核危机中,由于缺乏正常沟通与对称信息,美国与朝鲜的相互核威慑曾使朝鲜半岛处于核大战的边缘。核威慑失败而引发的核战争极具危害性,对人类的整体性存在和环境保护构成了直接威胁。另一方面,核威慑可能会影响核技术的和平利用,造成新的核军备竞赛。核威慑的低成本与好效果刺激一些国家致力于核武器的开发,遮蔽了核技术的和平利用与向善发展。伊朗、朝鲜等国家曾将发展核武器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这导致美国对它们进行经济制裁和技术封杀,从而影响了核技术正面价值的开发利用。同时,核威慑可能会引发核军事技术的恶性升级竞赛。朝鲜的核威慑为美国升级战术核武器和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提供了借口,而美国的举动又促使俄

罗斯开发核动力导弹和无人核潜艇等武器,如此的恶性循环使全球的核秩序平衡受到严重冲击。可见,核威慑技术风险的实质是核武器所蕴含的巨大物质技术力量对人的异化,遮蔽人的道德理性与技术发展的向善性,使核技术的物质力量成为压制人的异己力量。

## (二) 政治风险

核威慑的政治风险主要是指核武器的军事运用对政治领域产生的不确定的负效应。一方面,核威慑可能影响国际信任体系与国家信誉,降低国际核合作体系的稳定性。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信任可以被定义为: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sup>[18]30</sup> 虽然国际社会的信任不同于个体的信任关系,但是国家信任关系也是建立在对国际信任系统的信心之上。核威慑可能使国家间充满怀疑与猜忌,降低了国际核合作体系的稳定性。核威慑还可能会损害国家信誉,影响国家软实力。因为如果核威慑失败后发动核打击,那就使核威慑本身失去了意义。而如不履行威慑,就会使国家的核威慑能力受损,从而影响国家的信誉及其软实力。另一方面,核威慑可能引发强权政治和反核运动,影响国际和国内政治格局。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凭借其核绝对优势推行强权政治,企图凭借其核威慑能力构建单极世界,却造成核扩散态势的加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推行所谓的“美国优先”政策,试图提升国家核武库力量,并强行推动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这给国际政治稳定带来极大冲击。与此相对,正是因为一些国家任性的核威慑,使大批科学家与众多平民发起反核运动,在国际国内形成了较大影响。美国反核运动的政治人物中“主要是民主党自由派最积极,特别是那些准备竞选总统的民主党人,‘正迅速走在运动的前列’,想乘此机会把共和党‘赶下台’,而他们的主张其实只是在核竞赛中的不同做法,更多的是战争的手段”<sup>[19]</sup>。韩国因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而与中国的国家关系接近历史冰点。韩国前总统朴景惠下台之后,新的总统候选人中就有以撤销“萨德”为由参加竞选的。可见,核威慑能够影响政治关系,无论对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都可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实际上,核威慑的政治风险的根源在于,国际核力量的非均衡性分布使核威慑的巨大物质利益分配的正义性与

核威慑的政治合法性存在结构性矛盾,导致核威慑的国际核合作体系处于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之中。

## (三) 道德风险

核威慑的道德风险是指“某些道德原则和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的推行、践履有可能导致不理想效果或负面影响的危险性”,“也可以指一种社会措施所可能引起的社会可能道德后果的不确定性,并且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是立足于其可能的结果及其潜在的危机或风险而言的”<sup>[20]</sup>。一方面,从行为对道德产生的影响来看,核威慑会损害政治德性。朝鲜领导层过分依赖核武器的威慑能力,弱化了国家理性,放弃了对政治智慧的追求,已经迷失在核威慑的技术崇拜中。核威慑从手段上看是作为恶的手段,其合理性在于维持现有和平秩序的目的善和结果善,它实质上是基于功利主义。核威慑的功利主义容易忽视人的基本权利,挑战了人类及未来人的生存权利以及其他生物的环境权利。核威慑以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这种取代不是基于权利,而是基于权力关系。任性的核威慑是基于权力意志,与现代社会的权利精神相违背。任性的核威慑把主体国家的利益置于核垄断之上,没有尽到保护无核国家的义务,使权利与义务不对等。另一方面,从道德对行为的影响来看,当前存在核和平主义和核霸权主义、核恐怖主义等偏激型道德。核和平主义是对核威慑持绝对否定的态度,认为用核武器来威慑毫无道德可言。核霸权主义实际上是极端的现实主义,它漠视核道德,认为可用核武器来“弱肉强食”。在核武器无法全面销毁的情况下,单方面彻底放弃核力量是非常危险的。绝对的反核是一种绝对理想主义,也是不理性的行为。核霸权主义只是单边考虑用核力量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而不考虑核力量的平衡。核霸权主义带来的只会是动荡不安。极端情况下,核霸权主义还会导致核恐怖主义。核恐怖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虚无主义,它认为核威慑无需道德,人只是手段性的工具。正是因为美苏的核霸权主义给其他国家带来生存压力,进而引起核扩散,这才给核恐怖主义提供了机会。核恐怖主义的目标在于制造恐怖,使核武器成为真正的武器,成为它最原始的目的。它完全把人当成手段,将核威慑目的、手段、结果统一为恶,获得“至恶”的形式。

## 四、核威慑的价值考量

如果说,核威慑的复杂性和风险性特质使核威

慑的价值考量成为必要,那么,核威慑的合理性分析则为其提供了价值可能。核威慑的价值考量就是要厘清核威慑的价值性质、结构及其功能,是要确立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类利用核武器的合理性限度,因此,它是人类进行核治理的前提条件。核威慑的价值考量需要回答三个核心的问题。一是核威慑的价值来源,即核威慑的价值到底依赖什么?二是核威慑的价值内容,即核威慑的价值有哪些?三是核威慑的价值立场,即核威慑到底是为了谁?

### (一)核威慑的价值来源

“价值既是主体的物化或对象化,又是客体的入化。”<sup>[21]97</sup> 价值是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性存在,是主体内在需要的客观化与客体属性的主观化的辩证统一。因此,我们不能以主体的需要而放大核威慑的价值,也不能因核威慑的复杂性与风险性特质就否定其客观价值,而应该在客观的国家利益关系之中来确证核威慑的价值。换言之,核威慑的价值取决于一定历史条件下国际关系的客观存在,并不以单方面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一些学者全盘否定核威慑的价值,这是片面的核和平主义。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对核威慑概念认知的窄化,没有研究广义的核威慑现象,认为它就是言语暴力,不符合中国“崇礼尚和”的传统。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核威慑将长时间内持续存在,这也决定我们的主观认知必须符合这一客观社会存在。从本质而言,核威慑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它有自身的发展逻辑,我们不能以传统农业文明的道德标准来全盘否定核威慑“此在”的价值,而要在“此在的共在之中”<sup>[22]149</sup> 来考察核威慑的道德意义。另一方面,由于历史上我国曾长期受到美国与前苏联任性的核威慑,由此形成了对核威慑潜意识的抵抗情绪,这种集体无意识影响了对核威慑价值的理性判断。实际上,核威慑作为核武器的使用价值之一,它的客观价值并不以主体的主观评价而转移。只要战争还会存在,核武器就可能会被制造或使用,核威慑的军事价值就会存在。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核威慑还具有特殊境遇中的道德价值。因为核威慑的现实合理性就是反对甚至消灭核霸权主义与核恐怖主义。换言之,强权国家和恐怖主义者对核武器的使用方式和核威慑利益的分配方式决定了核威慑“止戈为武”的价值。因此,核威慑的价值依赖于人类对核武器的实践方式及其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不能单凭主体的需要或核武器的特性而脱离现实利益关系来进行价值评价。

### (二)核威慑的价值内容

核威慑的价值可分为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它的物质价值主要是军事价值,它的精神价值主要是道德价值。核威慑作为核武器的使用价值之一,它本身是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是人类科学家艰辛探索原子世界的成果之一,因此它具有一定的基于真理的军事价值。同时在一定道德条件下,核威慑的利用可以产生道德价值。用于和平和自卫防御目的的核威慑就具有和平与正义的价值。然而,核武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联盟集体科研的结晶,这种核技术权利应该由人类共享,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特性,核技术被少数国家掌握,核科学的自由价值受到限制,因此,人类只有通过和平与正义的价值补益才能达到核威慑的价值平衡。在冷战中,美苏之间的核威慑是用“恐怖的平衡”来达成和平。由于缺少“正义的和平”,美苏走向了核军备竞赛的迷途。因此,在冷战结束后,正义与和平应该成为核威慑的共同价值基础。在当前国际政治关系中,核威慑的正义价值显得更为紧要。对所有主权国家而言,“一个基本的自然义务是正义的义务,这一义务要求我们支持和服从那些现存在的和应用于我们的正义制度。它也促使我们推动还未建立的正义安排产生,至少在这无须我们付出很大代价的情况下”<sup>[13]110</sup>。因此,我们应该建立核威慑的正义准则与正义制度,使正义成为核威慑的核心价值原则。核霸权主义与核恐怖主义只会破坏世界和平,无视国际正义的诉求,使核威慑的价值根基消解成为“至恶”的形式,因而是没有道德价值可言。核和平主义将和平作为道德义务,但忽视了正义的价值需要,因此也不是合理的价值形式。由于核威慑的复杂性与风险性特质,如果单讲军事价值会落入核霸权主义与核恐怖主义的泥淖,而单讲道德价值则会忽视核威慑的现实条件而掉入核和平主义的迷阵,因此,核威慑的合理价值形式必须是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统一,军事价值与道德价值的统一。合理的核威慑必须建立在合理的价值坐标之上。核威慑限制了自由的价值,就必须增益正义与和平的价值,如此才能使核威慑具有平衡的价值基础,核威慑才有合理性可言。

### (三)核威慑的价值立场

核威慑的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是建立在一定的价值立场之上。核威慑的价值主体是个人、国家或是人类。由于《核不扩散条约》的限制,世界上的



拥核国家并不多。因此,核威慑的军事价值是对少数主体而言的,它的价值并不是普遍性的。核威慑的道德价值必须具有严格的道德条件才能成为现实普遍的价值。也就是说,只有以正义与和平为价值目的的核威慑才具有道德价值。要实现核威慑的普遍的合理价值,就必须限制其军事价值而发掘其道德价值。而如要实现道德价值的普遍性,就必须对核威慑的目的价值与手段价值严格约束,就必须以人类的整体利益为基准。因此,核威慑的价值立场应该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之深切关照。正如罗尔斯所言,职责“是作为我们自愿行为的一个结果产生的”<sup>[13]107</sup>。任何选择成为拥核国的主体都被赋予特定的职责,那就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拥核国应该自觉保障核秩序的安全稳定,维护核权利与义务的公平,承担更大的国际道德责任,不断促进人类发展与世界和平。基于此,习近平在世界核安全峰会上提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参与构建国际核安全体系,同各国一道推动建立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sup>[23]</sup>,“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前提下,所有国家都要参与到核安全事务中来,以开放包容的精神,努力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sup>[24]</sup>。由此,经过长期的核实践,我国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核威慑道德观,即核合作主义。它认为核威慑有道德可言,但需要在一定的核合作体系之内,需要遵循共同的伦理与法律规范。核合作主义立足于当前国际社会特性,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核威慑这一现象放到人类历史的广阔视野当中,它认为核威慑存在合理性限度。在当前的历史阶段,核合作主义具有保护国家主权和基本人权,维持世界和平的价值,它植根于人类整体利益与共同命运,增益核威慑的正义与和平价值。因此,核合作主义是合理的价值形态,为人类增强对核武器的理性能力提供了可行路径。

## 五、结语

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是由于冷战利益格局和冷战思维方式还不同程度存在,一些国家仍在扰乱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局,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sup>[11]58</sup>。直至今日,美国国会还未通过1996年在联合国签署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试图不断扩充其核武库来增强核威慑能力。目前美国与俄罗斯均无意

继续裁减核武器,双方的核军备竞赛有愈演愈烈之势。美国在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所谓的“美国优先”,还在2018年《核态势评估报告》中把俄罗斯与中国列为最重要的核战略竞争对手。同时,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这对东北亚乃至全球的核力量平衡与核安全秩序构成威胁。可见,当前的国际核安全局势并不乐观,我国面临着重大的核安全挑战,这需要我们对其核威慑的价值进行再认识。一些国家继续奉行核霸权主义,没有自觉履行核大国的责任义务,这就为以正义与和平为目的的核威慑的价值生成提供了条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sup>[11]53</sup>新时代的强军梦需要我们创新我国的核威慑理论,强化核威慑能力,不断提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软实力与硬实力。随着新形势的变化,只要我们坚持核威慑的和平目的与正义防御原则,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立场,核威慑的理论创新能够提升我国的软实力,对维护我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利益与日益发展的海外利益,实现新时代的强军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有助益的。但同时,核威慑因其自身对巨大物质力量的意向性,使人类的自由意志容易受巨大的情感冲动与自我镜像的压制,对道德理性存在极大挑战,使得核威慑存在极大道德张力与诸多风险。因此,新时代的复杂国家关系与核安全形势,要求用更为广阔的道德视域来看待核威慑,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核威慑的合理性与风险性。我们应坚决抵制毫无道德可言的核讹诈,自觉承担核大国的责任义务,充分发挥核威慑的正效益并有效避免其负效应。

## 引用文献:

- [1] 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学到手——关于军事辩证法[N]. 解放军报,2016-06-01.
- [2] 李建华,冯昊青.核伦理学研究的转型与走向[J].哲学研究,2008(4).
- [3] 迈克尔·沃尔泽.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M].任辉献,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 [4] 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New York: Doubleday, 1966.
- [5] 王甘棠,孙汉城.核世纪风云录[M].北京:科学出版

- 社,2006.
- [6]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 阎学通,陈寒溪,等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 [7] 毛泽东.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 [8] 亨利·基辛格. 核武器与对外政策[M]. 北京编译社,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 [9] 伊曼努尔·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 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 [10] 第四届核安全峰会取得重要成果[J]. 国外核新闻,2016(4).
- [1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2] 约翰·罗尔斯. 政治自由主义[M]. 万俊人,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 [13]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何包纲,廖申白,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14] James Der Derian. The Value of Security: Hobbes, Marx, Nietzsche, and Baudrillard [M]//Ronnie D. Lipschutz(ed.). On Securit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
- [15] 乌尔里希·贝克. 世界风险社会[M]. 吴英姿,孙淑敏,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16]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上[M]. 时殷弘,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17] 左高山. 敌人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 [18]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 [19] 王保勤. 美国的核争论和反核运动[J]. 世界知识,1982(11).
- [20] 高兆明. 应当重视“道德风险”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2000(3).
- [21] 李连科. 价值哲学引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22] 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7.
- [23] 习近平. 在荷兰海牙核安全峰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03-25.
- [24] 习近平. 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 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在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6-04-03.
- (责任编辑:栗世来)

## Four-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on Nuclear Deterrence in the New Era

LIU Lile<sup>1</sup>, LUO Chengyi<sup>2,3</sup>

(1.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2. College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Hunan China; 3. College of Marxism, Hunan City University, Yiyang 413001, Hunan China)

**Abstract:** Facing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nuclear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complexity of nuclear deterrence is manifested in the definitions of motivation, responsibility and the judgment of good and evil. Nuclear deterrence itself possesses reasonable value of low cost and good effect, providing security guarantees for maintaining world peace and building a human community with shared destiny. However, nuclear deterrence is essentially an intentionality to use huge material force, which may suppress free will and cause technical, political, and moral risks. In considering the value of nuclear deterrence, we should clarify its source, content and standpoint. It is a nuclear power's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 to dialectically recognize the rationality and risk of nuclear deterrence, uphold the value standpoint of a human community with shared destiny, and play a positive value of nuclear deterrence so as to avoid negative consequences.

**Key words:** nuclear deterrence; complexity; rationality; risk; value